

香港文学简史

施建伟 应宇力 汪义生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文学简史/施建伟等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0

ISBN 7-5608-2101-4

I. 香… II. 施… III. 文学史-香港 IV. I209.9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187 号

香港文学简史

施建伟 应宇力 汪义生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常熟市印刷八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5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2.00元

ISBN 7-5608-2101-4/G·194

如遇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地址:常熟市梅李镇通江路21号 邮编:215511

目录

回顾与前瞻(代序)——谈香港文学	曾敏之
绪论	(1)
上编 现代香港文学(1919 ~ 1949)	(10)
第一章 香港文学的诞生(1919 ~ 1937)	(10)
第一节 鲁迅与香港文学的发轫	(11)
第二节 文艺刊物和文学社团	(13)
第三节 新文学作品悄悄地萌芽	(15)
一、小说	(15)
二、诗歌	(17)
三、散文	(19)
第二章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1937 ~ 1945)	(21)
第一节 香港成为抗战时期全国文化中心	(21)
第二节 文学创作第一次高潮	(24)

一、小说	(25)
二、诗歌	(34)
三、散文	(40)
第三章 内战时期的香港文学(1945~1949)	(45)
第一节 文艺刊物和文学活动	(46)
第二节 文学创作再度兴起高潮	(47)
一、小说	(48)
二、诗歌	(50)
三、散文	(52)
下编 当代香港文学(1949~1997)	(55)
第一章 当代香港文学的铸形	(55)
(1949~1970)	(55)
第一节 风风雨雨 20 年	(55)
第二节 文学园地及社团活动	(59)
第三节 创作概况	(61)
一、小说	(61)
二、诗歌	(89)
三、散文	(94)
第二章 文坛开始出现了横向交流	(100)
(1970~1983)	(100)
第一节 曲曲折折的发展历程	(100)
第二节 文学园地及社团活动	(102)
第三节 创作概况	(106)

一、小说	(106)
二、诗歌	(121)
三、散文	(138)
第三章 过渡期香港文学(1983 ~ 1997)	
.....	(164)
第一节 在双重格局中的重新定位	
.....	(164)
第二节 文学园地及社团活动	(171)
第三节 儒商文学现象	(176)
第四节 创作概况	(181)
一、小说	(181)
二、诗歌	(226)
三、散文	(250)
后 记	(266)
参考文献	(268)

回顾与前瞻(代序)

——谈香港文学

曾敏之

1997年举办的“文学节”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香港已进入“九七”回归祖国的途中,值得祝愿与思考。

当香港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作为构成香港文化一部分的文学,今后发展的趋势如何?也值得考察与研究。

从历史的规律看,认识过去、了解现在、议论将来,是必要的,文学的发展也不能割断历史。

众所周知,香港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但是香港的文化形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学亦然。

中国有“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传统,从20年代开始,就已有鲁迅、许地山为香港带来新文学的种籽。接着30年代、40年代继有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文学巨子南来香港,为新文学开拓前途,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把“五四”时期形成创作主流的写实主义扎根于香港,从而产生了在香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黄谷柳写的《虾球传》,侣伦写的《穷巷》,舒巷城写的《太阳下山了》,夏易写的《少女的心声》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反映了二战后香港社会的变化。文学杂志如茅盾、楼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端木蕻良主编

的《时代文学》，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萧乾、杨刚前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周刊，以及《星岛日报》、《华商报》的文学副刊也为散文、诗歌循着“五四”新文学的指向而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作品。在那些年代，香港的文坛一度呈现灿烂的景象。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了，历史转入了新的阶段，香港文学也出现了另一种局面，用陈德锦的说法是“50年代之后，在社会形态上与中国大陆的断裂而产生的独特的香港文学言说”。更明确的表述是：内地的新文学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而香港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原因，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连成一片的缘脉暂告中断了，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新态势，也就是“非连续性”。

在这样的新态势下，具有立场、观点不同的作家，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美元文化”作品以及亲台作家的作品，如张爱玲写的《秧歌》、《赤地之恋》，赵滋藩写的《半下流社会》，丁渺写的《中共文艺总批判》等不下数十种之多。

与“美元文化”相对立的是进步作家所发表的作品，如唐人写的《金陵春梦》，又以阮朗笔名写的小说，曹聚仁写的《万里行》，何达写的诗歌，叶灵凤、吴其敏的散文，由吴令湄主编的《文汇报》文艺周刊及袁和平主编的《文艺世纪》、吴其敏主编的《海洋文艺》所发表的文章。

贯串于50年代的香港文学虽然形成对立的壁垒，但也就是在50年代产生了多元化的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艺思潮的传人。

二

香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地，以介绍、提倡现代主义思潮的文艺刊物如《文艺思潮》杂志起了重要的影响，创办人马朗宣称：“我们出版这本杂志，从头就是要在革命的狂流中开始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潮流——这个潮流就是现代主义。我认为，通过现代主义才可以破旧立新，这是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这个刊物有

系统地译介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而相应起了推动现代主义文学的是 1958 年成立的“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称以“推展香港文学艺术运动”和“发展现代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作为主要任务。

在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除了 60 年代处于动荡之中，文学陷于沉静状态之外，香港文学是沿着多元化的道路发展的，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

1. 先是通俗小说风行一时，以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代表，从 50 年代以迄现在，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对传统的武侠小说起了冲击、改革的示范作用。倪匡的科幻小说则追随科技的进步而尝试新的表现；

2. 现代主义文学刊物不断涌现，如《盘古》、《八方》、《诗风》、《素叶文学》等都在探索，发表了大量现代主义的作品；

3. 实验小说出现了，如昆南的《地的门》、刘以鬯的《酒徒》，都在创作实践过程中有了收获；

4. 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的形式作新的尝试，有也斯的短篇小说《养龙人师门》，西西的《我城》、《哨鹿》，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维多利亚俱乐部》等；

5. 爱情小说大量出笼，依达、凯伦、亦舒、严沁、林燕妮、李碧华的作品拥有许多青年读者；

6. 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也各树一帜。社会小说有杰克的《名女人别传》、《改造太太》，高雄的《经纪拉日记》、《二十年目睹香港怪现状》，都是流行一时的讽刺作品。到了 80 年代，梁凤仪以擅写香港商业竞争、财经风云而成为多产作家；

7. 以都市题材进入创作的一批作家如金依、海辛、陶然、张君默、东瑞、白洛、陈浩泉、巴桐、陈娟等，反映了都市小说的新发展；

8. 香港的新诗创作，有沿“五四”新诗道路成为写实派诗人的如何达、王一桃、张诗剑、黄河浪、舒非、梦如等，也有现代派诗人如戴天、古苍梧、也斯、黄国彬、胡燕青、羁魂、秀实、陈德锦等；

9. 散文、杂文则从 50 年代以来就是多姿多采的文体,按内容可分为社会性、专业性、抒情性、政论性……融会中外、贯通古今学识以见于散文、杂文的写作,可说是名家辈出,如余光中、董桥、小思、梁锡华、黄维樑、金圣华、胡菊人、岑逸飞、张文达、柳苏、高旅、忠扬等都是,表现的形式是短小、精悍、多能直抒胸臆,直到现在仍然成为香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的文学多元化所呈现的缤纷景象是成就的记录,是与香港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由于适应商业经济及市民趣味的需求,因而就有文学多元化的出现。

三

当香港跨入 80 年代,随着香港提上回归的日程,《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了,《基本法》制定了,香港文学也转入了新时期。

从历史意义来说,结束了香港百年多的殖民统治,今后将循“一国两制”回到祖国的怀抱,是值得庆祝的大事。但文学方面却出现了有忧有喜的现象。

不必讳言,对香港的回归,文学作品对过渡时期的香港已有所描绘。刘以鬯、陶然、陈浩泉、叶妮娜、也斯、白洛、梁锡华都在作品中接触了香港人的心态,描写对香港前景有所忧虑而移民的形形色色成了突出的题材,许多散文杂文也有忧时的抒写,这也反映了作家的观察带有关心政治的倾向。

与关心政治有关的是向来处于散漫状态的作家,在这过渡时期却自动组织起来了,先后有几个较大的文学团体组织,如香港作家联会、香港作家协会、香港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香港文联)、香港笔会等。从各个团体所制订的章程可以看到,都是标出以维护作家权益、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为宗旨的,各个团体的成员成分各有不同,但是在这过渡的敏感时期形成组织,也就对文学事业具有一定的影响。

看来是出于“九七”的政治因素所推动，向来在香港殖民统治下不受重视的文学，却因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成立，以拨款方式对作家及作品的出版加以资助了，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文学著作有了较多数量的出版，全港中文报章也锦上添花，多家大报开辟了文学副刊。另一方面，举办文学征文比赛也蔚为风气。香港文学团体与内地的交流也加强了，这有助于香港文学扩大影响的空间。

这一系列现象，对作家创作及文学发展无疑是积极的鼓励。

四

如今，“九七”在望，屈指可数了。香港文学的前景如何？当是文学界所关注的。

根据超过半个世纪香港文学所经历的历史进程看，可以作出理性的考察，得出如下的判断：

70年代的经济飞跃，是促进香港文学呈多元化的重要因素。香港的经济继续繁荣，文学也会有欣欣向荣的远景。

但是文学本身有其规律，就是创作自由。《基本法》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已规定了可以自由发展，这是对创作自由的保证，有利于推动文学事业，也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流派的竞争。

香港处于东西文化的汇合点，有利于作家文学事业的追求，不论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都可在形式方面借鉴有益的技巧而有新的表现。就是以外文写香港题材的作家，也有用武之地，例如反映怡和集团历史的《望族》就是一例。

香港是商业经济的都市，文学已呈商品化，也就有流于庸俗化的倾向，为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仍需要社会的帮助，因此，如艺术发展局所采取的支持鼓励的做法，“九七”后会继续推行。

最后，我还想强调三点——

一是香港是人才荟萃之区,已拥有一支文化素养较优的作家队伍,创作力量不弱。过去的成就已证明,香港文学不论在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两方面的探索,已有了可观的表现,这对香港文学的发展来说是具备了主观的条件;加以香港是国际性的金融贸易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合点,客观环境对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因此,作家也必然充满信心,一定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为香港文学也为中国文化大厦缀上光彩夺目的珍珠;

二是今后香港政经贸易文化文学的前景,不论荣枯得失,都与内地的治乱分不开。前任港督麦理浩曾向香港工商界提过“向北望”的警句,值得深思。清代诗人龚自珍有诗云:“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也可引为香港参证。具有智慧、良知的作家,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应该付与充分的关注,而不是游离于现实,清高自许,隔海观望,漠不关心;

三是香港是国际城市,也是联系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作家的一个中心,多年来通过香港文学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发展已取得很好的成绩,可以预见,今后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组织、研究上会有进一步的贡献。

绪 论

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时代背景,成为东西文化的一个交流中心。

香港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在“九七”回归前,香港文学是沟通祖国大陆和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桥梁。

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具有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作用。回归后,香港文学除原有的功能和特征之外,它又是体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新特区文学的载体。香港,举世瞩目;香港文学,举世瞩目;这是 20 世纪和 21 世纪新旧交替之际,世界文坛的独特景观。

从历史上看,香港文学是中华文明的延伸。关于香港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一部分的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故在此不赘。我们要指出的是: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造成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祖国大陆的隔离状态。此后,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①:与中国文学分流的时期。“九七”回归,使香港文学开始了与中国母体文学重新整合的新阶段。下面我们想从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坐标的方位上探索一下香港文学的定位问题。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从学科建设方面的轨迹来看:从“港澳台文学研究”、“台港澳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

^① 有关 1949 年以后的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请参阅拙文:《当代香港文学铸形》,刊于《香港文学》月刊第 147 期,1997 年 3 月出版。

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这些名词的频繁更变中可以窥见这个新兴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一斑。然而，无论怎么称呼，这个新兴学科，在80年代以前是中国研究界的一个空白点和盲点。1980年，在曾敏之先生等人的推动下，港台文学研究会于广州成立。1982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届港台文学学术研讨会。1986年7月初，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学术会议在西德举行。而1986年12月26日~29日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这表明研究界已开始以全球性的整体意识来思考中国（包括台港澳）和中国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1988年。因为，这一年的12月5日~8日，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主办了“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以刘以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一开始就从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格局的坐标上为香港文学定位，突出香港文学特有的优势。刘以鬯认为香港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其他华人地区不可能取代的，它在沟通海峡两岸文学和世界各地文学的交往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刘以鬯提出应该在香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协会，推动各地华文文学的交流和发展。^①台湾李瑞腾先生认为，随着“九七”的到来，与内地的文学交往日渐增加，建立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世界华文体系的意念应该逐步形成。他指出香港文学已有自己的传统，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可以在这里尽心对话，它有条件和能力去检验各地华文文学的成就^②。

我们认为，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核心不是华文，而是文化，也就是华人的文化。因此，华文文学实质上应该是代表华人文化的

① 详见香港《大公报》1988年12月11日星期日增刊上所刊出的陈培莹的《香港文学具有三大特色》一文。

② 同①。

文学,正是世界各地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共同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个球形的立体结构,作为软组织部分的文学,都受制于球心的那个文化内核。我们觉得葛浩文教授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作家,包括国内外的汉学学者,一般关心的应该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作品里表达的情感、内容与精神内涵,只不过他们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举例来说,一般提到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主要是以‘文化’为主,而不是‘文字’,不是光分辨它‘用什么语言’来写。所以当人们说到 ENGLISH LITERATURE 我们立刻的反映是‘英国的’,而不是‘英文的’文学(美国文学也用英文)①。”

因此,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里,香港华文文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

香港文学的定位,实质上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的双重制约下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双重格局制约下的香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文学还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它都是一个独特的形态。所以,当美国、欧洲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华人作家为华文文学难以进入当地国家主流文学而苦恼时,香港文学在文化传统、文题范式和文学精神等方面,从来都认同于中国文学母体,它对自己的身世毫不隐讳——它是中国文学的延伸,偶然的分流,是暂时的;必然的整合,则是它的归宿——它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一章,特殊的一章。

我们认为,以独特形态为标志的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特别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中——角色到位后的产物。换言之,是香港文学与中国、与母体文学暂时分流时期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和祖国大陆呈现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游离于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分流时期,香港文学在保存母体基本素质的同时,又在这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文学新

① 引自台湾《文讯》革新,第48期82页。

质：“香港性”。香港的社会风貌、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等等，都是这一文学新质（“香港性”）的重要内涵。正是在这分流时期，香港文学以自己特有的形和质定位于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格局之内。

香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伸延，源远流长。开埠以来，不仅东西文化在这里互相碰撞、渗透、交融，而且，各种文学形态多元并存。“分流”之前的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的珍贵财富，而“分流”之后的“香港性”的特征，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里定位的依据。由于文学的“香港性”的形成是文学内部运动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开花结果的过程。

有的评论家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香港只有南来的作家、移民作家和难民作家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移民文学”、“难民文学”，而这些都是真正的香港文学，充其量只能称是香港的文学。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和《樱子姑娘》、徐訏的《江湖行》、李辉英的《乡村牧歌》、端木青的《故国的春天》等作品，因为所写的人是中国内地移民过来的，故事的背景也是中国内地，所以，被认为是“移民文学”，在这些“旅港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中，“对环境若缺乏投入感创作小说时，就算以香港作为背景，亦一样缺乏香港的色彩^①。”什么是“投入感”？这是一个很朦胧的概念，作为一个文学的判断的标准，在操作上有许许多多难以逾越的困难。我们认为，移民文学不仅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若回到文学作品的原生现象上来看，那些反映移民心态、移民生活的作品，往往有很浓郁的香港色彩。不要忘记——香港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真正的“土著”有多少，不过是移民时间的先后罢了。

上述论者对文学的“香港性”的标准是相当苛求的：即使以香港生活（人和事，以及环境）为描写对象，但如果缺乏对香港命运的

^① 请参阅黄康显的《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社，1996年4月5日）。

投入感,也仍不具有文学的“香港性”。这是很难使人认同的,因为若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文学的“香港性”的高扬只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九七”回归的“过渡期”。

政治冷感,曾是80年代以前的香港人在商品社会的的生活方式孕育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979年香港回归问题提出,香港人沸腾起来了。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主权回归的“过渡期”。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是香港文学的香港色彩最灿烂的日子,也是香港文学的“香港性”高涨的时刻。

如果说,在“九七”问题提出前,香港的文学是以“移民文学”为主的;如果说,“对香港环境”“缺乏投入感”是“移民文学”的通病,那么,“九七”问题的出现牵动了所有港人的心。过去以不关心政治自诩的港人,现在来了一个180°大转弯,掀起了全民参与的泛政治化的浪潮,在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的驱动下,千家万户的思路都聚焦在“九七”情结这个焦点上。于是,文学的“香港性”凸现,香港文学迅速地完成了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过渡。正像有的论者所说:1997年对香港文学来说,是个重要的契机:“1. 1997问题打破了香港与中国多年来的隔阂。……把香港命运联系到中国命运上,将是香港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2. 1997除了促使香港作家关注中国外,也促使他们关注香港的现实。3. 1997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冲击香港人的政治冷感^①。”

政治上的主权回归过渡期的社会政治形式促进了文学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过渡——同时又是从“分流”形态向“整合”的过渡。所以,“过渡期”在香港文学史上就成为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1. 对于回归而言,1984年12月19日起香港地区正式进入“过渡时期”。我们以此为据,称1984年12月19日~1997年7月1日期间的香港文学为过渡期的香港文学。2. 若

^① 引自王仁芸《一九九七与香港文学》,刊于《香港文学》月刊第一期28页。

从文学内部运动的规律来看,也正是在上述的同一时空内,香港文学的“香港性”由量变到质变而导致从“移民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大潮过渡到以“香港性”为主体的“当代香港文学模式”^①,这是香港文学在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

政治历史概念上的“过渡”和文学的“过渡”在同一时空的叠合,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时代的必然。我们说两个“过渡”叠合,实际上只是宏观意义的叠合,而不是在完全相同的时空中的分秒不差的绝对叠合。因为,严格地说,从文学内部规律来看,早在《虾球传》和《穷巷》问世之时,香港文学已进入了从“移民文学”向“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演变,但是由于以香港性(香港特色)为主要特征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寥若晨星,所以,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演进得十分缓慢,直到“九七”回归问题的提出,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主权回归进入了倒计时数的读秒时刻才得以实现。在“七九”回归指日可待的日子里,不同信仰、观点,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政治态度的港人都被凝聚在“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中,“九七”情结牵动了港人的心,也牵动了文学家的良知。“九七”像一张人人都必须填写的答卷,不管选择什么答案,限时交卷。“爱港爱国”,这是绝大多数香港人和香港作家的共同选择。不言而喻,“九七”加速了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进程,催化了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质变。这也是政治和文学之间良性互动的一个范例。

香港人曾自讥是“经济动物”。不问政治,只知赚钱,这是众多香港人的写照。如今不同了,“一国两制”,与香港的命运,与每一个香港人的前途都休戚相关。今天的香港人,要比内地人更加关心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化、关心改革开放的国家大政方针。

进入过渡期后,香港文学涌现出许多“九七”题材的作品,作家

^① 关于“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提法,黄维梁在他的《香港文学初探》和《香港文学再探》中有精辟的论述,笔者借用了他的提法,特此说明。